

新媒体时代的民主：传播、监督与隐忧

——评约翰·基恩的《民主与媒体衰颓》

杜 欢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产生的诸多新的民主理论成果都源自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投票选举间隔期间的民主实践的思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民主实践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同代议制民主发展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各种新媒体的产生与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思民主形态的变化和促进民主理论的创新，便成为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学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对于民主、媒体与政治关系等主题保持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并在近年来提出和倡导了“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的理论。基恩于2013年10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民主与媒体衰颓》（*Democracy and Media Decadence*）。在这本书中，他结合时代与现实的发展对媒体与民主的复杂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考察，并对其最新的理论思考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一、新媒体时代：如何发展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工人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沟通与交流条件的改善：“中世

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①时代的进步往往是以科学技术的革命与创新为先导的，而交通技术和传播媒体的进步，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形态和运作模式的转型，尤其是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成长，并使现代民主的发展逐渐成为可能。从历史中可以明显看到，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与这样的技术条件密切相关的。在特定意义上，民主所依赖的技术条件对于民主的实践形式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按照约翰·基恩的总结，民主至少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每一阶段都与一种特定的传播模式相关联。最初的古希腊大会民主属于一个口头语言的时代，典型的信息传递途径是步行与牲畜运输。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则进入了一个印刷文化的时代，印刷术的出现、书籍报纸的出版以及电报电话的发明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此后的民主所面临的则是以广播、电影和电视为主的一种多媒体渗透型社会，这一阶段的最新表现便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大量涌现。从一定程度上讲，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意味着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亦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分野，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一直是民主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和自身内在的问题，以代议制民主为主体的现代民主实践发展到今天，

已经出现了各种危机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民主，或者说如何创新民主形式、促进民主实践和发展民主理论，已经成为民主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自觉不自觉地要回答的问题。^②

同其他民主理论家不同的是，基恩更加侧重于从民主与媒体的关系角度来思考民主的发展问题。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的精神与精髓，尤其是民主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了转变，而重新思考和解释民主，就需要面对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基本现实。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传播充裕（communicative abundance）的革命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众多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的创新与进步日新月异，已经形成了各种媒体设施相互重叠与连结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几乎人人都可以在网络公共空间当中成为自媒体。^③毋庸置疑，这种新的时代特征会产生多方面的政治效应，而基恩用充分的案例阐释了其中一些重要方面：第一，推动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手段更加多元；第二，引发了有关公域和私域划分的争论，使日常生活与公共问题随着媒体的发展日益难以分割；第三，增强了媒体揭露政治丑闻的力度，使代议制民主中带有疏离公众倾向的精英权力面临更多挑战；第四，促进了非选举代表数量的激增，使选举政治之外的公共过程和公众人物的权威获得了极大提高；第五，导致了大量民众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使民主的实践主体和条件出现了全球化与世界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媒体与政治、民主和权力关系的讨论也日益深入，包括网络公民、电子民主以及维基政府等在内的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基本现实。

就基本社会认识而言，新媒体时代的这些政治效应，使传统的政治权力关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而传播条件的改进与民主的进步之间，似乎也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然

而，基恩充分意识到，媒体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媒体与民主》一书中，基恩便从“新闻自由”的角度切入，对于国家、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媒体的新闻自由理想在实践和斗争的过程中受到了市场竞争和国家权力的双重侵蚀与破坏。通过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应当通过调整公共服务的传播模式来促进公民的自由平等沟通，保障其利用媒体监督政府的“媒体审判权”。尽管他在此书中寄希望于“公共服务媒体”来保障新闻自由和民主，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并没有给出媒体与民主关系的确定性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视角和解释观点，旨在“激起对当代民主的想象”^④。

正是沿着这样的分析思路，基恩继续对当代民主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观察与思考。如前所述，在经历了前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民主面临的时代状况和技术条件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和解释这个阶段的民主实践及其特征。同时，传播充裕的新媒体时代在民主实践上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也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和表现。如果说基恩早期重视媒体所受的市场与权力的压制，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他似乎更加关心日益壮大的媒体对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这一时代的民主发展，存在着某种与媒体发展密切相关的总体趋势与特征。由此出发，基恩根据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并参考其他学者的观点，最终形成了其“监督式民主”的理论。

二、监督式民主：机制、起源与特征

“监督式民主”并不是约翰·基恩在本书中初次提出，早在2009年，他就在其论述民主发展历史的《民主的生与死》这部近千页的著作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了这个概

念和理论,并以此来概括民主发展的第三阶段。^⑤在基恩看来,监督式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新型历史形态,是一种“后选举式”或者“后威斯敏斯特式”的政治模式与统治类型,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众多不同种类的议会外权力审查机制的快速增长。这种民主形态同独立的公众和监督机构密切相关,它既扎根于国内的政府与公民社会领域中,也扎根于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的跨越国界的全球化趋势中。

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式民主拥有最为复杂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在这个历史阶段所出现的各种新型的权力审查与制衡机制是在此前的民主体系和民主实践中所不曾见过的。总体而言,这些监督机制广泛分布于不同的公共领域之中,发挥着多元的监督功能,而且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和发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监督机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包括公民陪审团、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智库、地方社区协商机制、消费者委员会、网络论坛和民意调查机构等等在内的监督机制创新,都可以纳入监督式民主的范畴之中。这些监督机制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党、议会与政府乃至利益集团的轻慢与压制,使投票与选举的实践范围和内容得到了极大扩展。原有的“一人一票一代表”的代议制民主模式日益显出其局限性,而“一人多利多声音、多票多代表”的原则逐渐获得了实践基础。通过这些机制和实践,各类监督者、各种新旧媒体和各个政治部门之间逐渐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同时也构成了监督式民主时代的基本政治版图。

基恩对监督式民主的思考,来自他对民主现实和未来走向的深刻关注,同时也来自他对目前民主理论状况的不满。在他看来,达尔、亨廷顿以及福山等人对民主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对民主实践的实际状况和现实条件缺乏新的认识与理解。基恩的

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他的这种批评倾向同样在其他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体现。举例而言,即便民主经历了第三波的发展,甚至可能出现第四波,但这些民主发展表象的背后也存在各种差异和问题,这种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亨廷顿等人理论的不足。^⑥他甚至曾经表示,我们已经没有了很好的民主理论,这使得民主与现实相隔万里,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入手,以更加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把民主与现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⑦

从历史起源来看,监督式民主发展的逻辑起点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因此,监督式民主实际上是对战后全球民主发展状况的整体总结。监督式民主的产生与发展需要一系列的因素和条件。在基恩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触发性因素在于世界性战争及其所引发的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战争一方面带来了独裁统治与集权体制的兴起,并凸显了代议制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重新认识独裁政治的根源,并对民主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思。同时,战后人权与民主的日益结合所引发的世界性维护人权的组织、网络与运动的发展,则极大地促进了监督式民主的形成,并成为这种民主实践的显著表现形式。从发展驱动力来看,监督式民主同媒体和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就成为重要因素,正如基恩所说:“如果全面战争是监督式民主最主要的催化剂,那么毋庸置疑,传播媒体是使其后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⑧传播媒体的发展促进了基恩所谓的多媒体渗透型社会的形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决定便能够对政治和权力网络产生实质影响。^⑨由此,监督式民主的实践形态日益多元,社会权力结构也不断被传播充裕的新媒体时代中的各种监督机制所侵蚀,这些都导致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

综合民主的历史发展和基恩的具体论述,可以总结出监督式民主的一些基本特

征:首先,监督式民主注重权力监督机制,并依赖公民社会的运行。民主本身所固有的监督功能,无疑受到了基恩的重视和青睐。就其自身特性而言,民主过程离不开公开、透明与监督。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当代民主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视觉民主(ocular democracy),这意味着现代政治过程需要愈发开诚布公地展现在作为监督者的公众面前。^⑩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存在的监督者和监督机构就承载起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并由此成为监督式民主的基本前提之一。

其次,监督式民主同媒体创新密切相关,并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基恩是在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语境中来观察和阐释监督式民主理论的,但是就其基本出发点和条件而言,媒体与技术因素发挥着基础性的影响。如前所述,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督式民主的实践形态,换言之,监督式民主能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媒体功能与技术支撑是否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技术因素。

再次,监督式民主存在多元的实践形式,并依赖未来时间的检验。基恩列举了大量监督式民主的运作机制,但他也承认,这张清单实际上像是一个随意堆砌的鸟巢,亦即这些多元的实践形式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体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基恩对于媒体发展丰富性的描述,也要远远多于对监督式民主的具体描述。这些都说明,监督式民主的发展还远未成熟,其实践形式依然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就此而言,监督式民主的发展前景并没有那么明晰。

三、媒体衰颓与民主的隐忧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充裕的特性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在表面上,这种特性的发展促进了监督式民主的形成,但实际上,媒体与传播本身的多重效

应和监督式民主对技术因素的过多依赖,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确定。如前所述,监督式民主还远未发展成熟,就此而言,关于媒体与民主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基恩改变了早期对媒体所受限制的侧重,转而对于媒体衰颓的倾向及其对监督式民主的威胁给予了极大关注,并由此提出了他对民主未来的思考和忧虑。

基恩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新媒体时代,充裕的传播和不受限制的媒体增长,并不会自动为民主的发展提供滋养。他提出了一种具有争议性的推断:一些强大的势力正在利用多媒体渗透型社会的这些技术与工具,而它们的利用手段和方式对民主具有损害效应。以虚拟网络为特征的媒体新技术与工具的扩散,实际上也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扩散的民主潜力正在经受媒体衰颓趋势的威胁。由此,监督式民主的基本原则与制度载体也就难以得到良好的保障。在这里,衰颓并没有像字面上那样意味着衰落和腐朽,按照基恩的界定,所谓媒体衰颓是指监督式民主的各种理想与传播媒体消极效应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前者包括自由公平的公共权力、观点的公开与多元以及各种代表对于包容和平等地对待一切公民的公开承诺,而后者则意味着媒体发展会助长观点表达的不宽容、对公共权力审查所施加的限制以及对事物发展路径的盲目接受。

简言之,媒体衰颓是同监督式民主的理想相悖离的负面效应,基恩在书中也详细阐述了媒体衰颓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是民主本身的定义与实践,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的叠加更是产生了多重效应。随着媒体的无限制发展和监督式民主的实践创新,相应的负面效应也会随之积累并最终表现出来。举例而言,从社会权力关系上看,包括信息在内的各种资源分配都难以摆脱精英控制和贫富差距的影响。

而在技术因素的推动下,穷人和富人之间在信息获取与传播权力上的鸿沟会被进一步扩大,这种分歧显然违背了监督式民主关于公民有权平等沟通的基本准则。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媒体力量的壮大会使众多国家的政党与政府愈加关注对媒体与传播的控制,颇为反讽的是,其中也包括了大多数发达的监督式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是,如果权力审查过程中的所有监督者和监督机构都严重依赖于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创新,那么一旦传播体系和技术支撑出现中断甚至崩溃,监督式民主便很可能会由此一蹶不振。根据这些分析,基恩对于监督式民主的未来发展表现出了一种审慎的忧虑,他在众多讨论场合中都表示,监督式民主的生命力需要留待时间来证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媒体衰颓的系统分析与充分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会前瞻性地防止某些倾向的危害,从而促进监督式民主生命力的继续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民主发展的一般讨论,必然会涉及民主化与民主转型,但从基恩的论述来看,他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实,按照基恩等人早期的理解,媒体的功能发挥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和仍处于民主转型的国家中是不一样的。就前者而言,媒体主要发挥交流观点、培育公民意识和公共话语的作用,以促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流。但是对后者而言,媒体对政治的负面效应便会凸显:“媒体不可避免地会对信息进行过滤,会传达它自己的议程安排;它们也会成为控制的工具或者是动乱与颠覆的工具,在冲突中与冲突后的情形下尤其如此。”^①媒体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这种特点,同样有可能构成媒体衰颓的一种表现,但基恩并没有将其作为重要的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变化至少出于两种原因:首先,基恩试图超越带有某种西方中心论的民主与民主化的话语,从历史和全球角度来重新审视民主实践的总体发展;其次,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运作都必须面对媒体技术的快速

更新与扩散,而在使世界日益扁平化的技术因素面前,所谓的民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这种语境下,在西方民主讨论中常常被作为例外的中国,被顺理成章地纳入监督式民主的考察之中。近年来,基恩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调查研究,对中国的民主实践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在本书中,他对中国的网络与媒体发展所引起的政治生态变化进行了专门分析,并兴致勃勃地论及中国近年来的一些著名的网络事件。毋庸讳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全面转型,中国新近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便是网络时代的来临和网络媒体的日益发达。基恩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政党国家保持了对各类媒体的引导和监管,在放开某些领域的同时也在严格控制着另一些领域。^②然而,各种带有抗争内涵的流行话语、群体冲突和公共事件,已经伴随网络力量的壮大而不断挑战现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在基恩看来,包括短信、微博和其他虚拟系统在内的网络工具的发展,正在培育着监督式民主的精神。当然,由于中国的特殊性,监督式民主的实践与现有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要远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媒体影响力的提升乃是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一方面,网络技术与媒体发展对政治形态的重新塑造,倒逼着中国政党与政府调整与完善自身的策略、组织与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在网络时代条件下对民主实践的探索与创新,也同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发展站在了相近的起跑线上。

四、民主理论的创新与反思:技术与实质

长期以来,基恩的学术观点已经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民主研究上的开阔视野和前瞻性观察。无论是他对媒体与民主关系的深入考察,还是对民主历史的开放性阐释,抑或是对监督式民

主的创新总结,都激发了人们关于民主理论的讨论与反思。上述这些内容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民主与媒体衰颓》一书的基本要旨。从基恩的研究风格来看,他并不倾向于用范式性的西方标准来进行民主研究,而是希望通过考察民主的各种地方性实践来总结出民主的时代共通性,从而真正促进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独特视角和基本关怀,保证了基恩在民主理论上能够作出自己的创新,提出关于监督式民主的一系列理论阐发。

前文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对监督式民主以及相应的媒体与技术条件进行了综合的评析。然而,从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同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民主理论一样,监督式民主理论也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它们一方面构成了监督式民主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也促使监督式民主需要不断开拓发展空间。

其一,在理论概括上,监督式民主所依赖的基本前提在于媒体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但是它的内涵与关怀则超越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成为对当代民主实践的总体概括。因此,监督式民主在理论的应用和扩展方面必须面对技术因素的单一性和民主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其二,在理论传承上,尽管基恩承认监督式民主对其他民主理论有诸多的继承,但他也凭借这种理论的技术特点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同其他民主理论的对话与衔接。因此,监督式民主若要巩固其理论优势,就必须正视其他替代性的民主理论,避免沦为自说自话。其三,在理论落实上,基恩指出监督式民主具有多元复杂的实践机制,但对这些实践的制度化条件却论述不足。事实上,现代民主的制度核心依然是以投票与选举为主的代议制度,而监督式民主主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就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更加系统的建构与对接。

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监督式民主本身并不完美,即便基恩本人也没有奢求它能够恰如其分地解决民主所面临的所有问

题。事实上,尽管监督式民主拥有较为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实践基础,但它与当代其他民主理论依然存在一定的共通与互补之处。结合民主本身的发展逻辑和上文的分析,监督式民主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第一,就民主的技术因素而言,需要重视技术因素对民主的正反影响。媒体发展对于民主政治与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技术与民主的关系视角出发,基恩不仅考虑到新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对民主实践的积极效应,更考虑到了其显性与潜在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技术因素往往是超越国界的,无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都需要面对,而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便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同时也对现代政治形态与民主模式产生了重要冲击,就基本逻辑而言,这种影响同样带有两面性或双重性,令人喜忧参半。

第二,就民主的内在性质而言,需要继续思考和弥合程序与实质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如何实现代表性是现代民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代议制民主发生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重程序而轻实质所导致的代表性不断流失。^③二战之后所产生的诸如参与民主、多头政体、协商民主、协和民主等替代性的民主理论,都是为了弥补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式民主与这些理论具有一致的内核,换言之,监督式民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代议制民主的消亡,而是通过一种新的角度对民主程序与实质的矛盾进行弥合与改善。

第三,就民主的实践要求而言,需要协调好存在性与有效性的复杂关系。民主首先要解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存在”问题,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保障条件。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技术创新无疑提供了这种前提,使人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存在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促进公

民民主参与和监督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这种实践的有效程度。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必须克服公众的政治冷漠、改善公共讨论的质量以及增强民主过程的权威。就此而言,只有在民主实践中辩证地处理好存在性与有效性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才能推动民主的积极发展,并真正促进民主的巩固。

五、结语:作为局部真理的理论

总体来看,基恩在这部视角独特的民主著作中,继续倡导了他所坚持的从更具历史感和世界性的角度来研究民主的主张。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基恩实际上更加侧重于论述媒体与技术的复杂发展状况,监督式民主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了陪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监督式民主是次要的,因为正是通过凸显新媒体时代的现实条件对民主实践的影响与制约,监督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才有了更加丰满的前提和基础,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究技术与实质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基恩看来,监督式民主是一种可以同大会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并置的最新历史形态,但其实践过程依然脱离不开由既有民主理论所导致的各种机制和制度构设。例如基恩所提到的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和地方社区协商机制等,实际上早就属于协商民主的范畴。所谓理论,有时就像一缕光束,能够照亮一处焦点,但却忽略了其他地方,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理论只是一种“局部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式民主能否作为最新的理论创新而涵盖其他各有侧重的替代性民主理论,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监督式民主不仅需要在实践上寻找更加有效的机制和制度,同时更需要在理论上同其他民主理论形成对话,从而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正如基恩所说,监督式民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要留待未来给出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反思与批判,不

断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

注 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 ② Sonia Alonso, John Keane, and Wolfgang Merkel, eds., *The Futur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③ Peter Fenn, "The New Media in Political Campaign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Management*, ed. by Dennis W. Johns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26.
- ④ [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 ⑤ John Kea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 pp. 585 - 747.
- ⑥ Jørgen Møller and Svend - Erik Skaaning, "The Third Wave: Behind the Number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October 2013, pp. 97 - 109.
- ⑦ 郭忠华编:《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 ⑧ [英]约翰·基恩:《监督式民主:新媒体时代民主实践的新理念》,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 ⑨ David Chandler, "Democracy Unbound? Non - linear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7, No. 1, 2014, pp. 42 - 59.
- ⑩ Jeffrey Edward Gree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Democracy in an Age of Spectato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1, pp. 7 - 31.
- ⑪ [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英]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 ⑫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2, 2013, pp. 1 - 18.
- ⑬ Frank Cunningham,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90 - 100.

[杜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 徐 焕)